

文明互鉴视域中的文化误读探微

On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魏丽娜 (Wei Lina) 傅守祥 (Fu Shouxiang)

内容摘要: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重要动能。在跨文化交流中, 客观的文化差异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误读”, 而各类主体的盲点、偏见甚至敌意则加剧了“理解的变异”。从思想生成的正向博弈与文化传播的文化增殖角度说, 正读、反读抑或误读都有价值; 特别是在文明史上, 有不少文学艺术经典在外传过程中所经历的“创造性”误读, 不仅没有扭曲反而丰富了其“现实生命”, 完成了一种意料之外的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 如寒山诗在欧美的文化旅行与经典化、流散文学的文化间性特征与文化融通可能、迪斯尼系列电影《花木兰》的文化误读善缘与恶果等。后新冠时代或许是前争端时代, 疫情带给人类社会的撕裂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 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协作会大幅减少, 敌意式误读助推文明冲突到达高潮, 人文奇缘被迫蛰伏待机。祈盼人们恢复理性, 以开放心态在跨文化碰撞中促进“和而不同”。

关键词: 文明互鉴; 文化误读; 跨文化交流; 他者; 和而不同

作者简介: 魏丽娜, 文学博士, 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比较诗学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傅守祥, 文学博士, 浙江省高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温州大学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与文化哲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普拉斯诗学研究”【项目编号: 17YJC75203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bstract: Culture is colorful due to exchanges, civilization is enriched due to mutual learning.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huma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bjective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led to various forms of cultural “misreading”, while the blind spots, prejudices and even hostility of various subjects have exacerbated the “variation of understanding”. In terms of the positive game of thought generation and cultural augmentat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ositive reading, negative reading, or misreading are all valuable. Especially i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man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lassics have experienced “creative” misreading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abroad, which has not distorted but enriched their “real life”, and completed an unexpected drift and grafting of cultural root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vel and canonization of Hanshan poetry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inter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spora literat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cultural misreading of “Mulan” in Disney series movies, etc. The post-COVID-19 era may be a pre-conflict era, and the human society is far more torn by the epidemic than people think. The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and hostile misreading will help br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o a climax. The miracle of humanity has been forced to hunker down and wait for new opportunity. People who pray for the restoration of rationality should be less arrogant and prejudiced, more respectful and tolerant, talk with others with an open mind, and promote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in the normal cross-cultural collision.

Key words: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thers;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uthor: Wei Lina,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MA supervisor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cerulean613@163.com). **Fu Shouxi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is Qianjiang Scholar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35,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Philosophy of culture (Email: fusx323@126.com).

20 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许多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念，还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韦勒克 368）。从本源上说，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阅读、研究、传播、消费、接受和变异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生发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跨时代、跨媒介传播与接受。但是，当下的文学批评却往往在“捧杀”与“棒杀”间游弋，鲜有“恰如其分”的时候和作品，更遑论人们一直梦想的“英雄惜英雄”或“高山流水遇知音”式的“神评”；在批评实践中，如若做到平心公论的“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¹已属难得。尽管少见，但是“知音”式的“神评”或“先知”式的“惺惺相惜”毕竟出现过且名垂青史，譬如别林斯基的批评

1 语见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陶渊明的诗《移居二首·其一》。

与风骨促成的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白时代”、T.S. 艾略特对 17 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发掘以及对其前辈诗人但丁和波德莱尔的重评等。

正如文学批评中的“知音难遇”一样，在全球化时代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中，文化知音和文明契合的事例不多，文化误读和文明曲解的事例却比比皆是。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与文化多样化一体两面的文化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以利于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 166）。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人们应该秉持世界主义立场，努力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之中，发现其优长，启迪自己的智慧（习近平 / 光明日报）。同时，在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当今，我们需要客观正视与恰当处置文明互鉴过程中的诸多“文化误读”现象，疏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尽力减少文化壁垒、避免文化冲突。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生成：带入性理解的化生与变异

在跨文化交流中，“误读”的原义是指歪曲了文本或其他阅读对象的原本含义，是对原文化的错误阅读和理解；其引申义是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及其文化错位。翻译的本意在于不同语言间的直接沟通与理解，但因译介效果、质量的不同，也成为产生和深化“误读”的重要环节，误译、节译、转译甚至错译、乱译源源不绝；由于每种语言深植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绝对对等的译介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中，词语的语义场建立在相应的文化之上，翻译仅能传达其核心含义而无法翻译其背后复杂的文化背景、情感因素和思维方式。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阿兰·雷认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困难；因为信息生产者的社会语言编码和读者、听者的编码系统不同，所以出现译码的困难。他说：“就是一位现代的中国读者对孔学原著的阅读，或是现代的一位英国人、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澳大利亚人对莎剧的观看都会提出无数的问题，出现了许多信息的缺失和大量的曲解”（雷 149）。

今日世界看似信息发达，但文化误读仍不可避免，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存在盲点，二是存在偏见，因为很多人往往带着历史惯性来看待他国文化。文化作为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和符号的有意义系统，它必须能够被人

们互译，并通过解释而达到理解、学习和接受。但是，由于文化解读中的对应性框架的缺失，误读或误解文化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因为自身的文化传统、思想背景不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即使对待同一个事物或文本，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人们总是习惯以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构成去理解对象，进行一种“先见”性、“成见”性的解释，这便是“文化误读”，即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跨文化交流是由自身特定视界出发去理会和梳理他者，从关注与研究的角度看，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被特定视界关注和整合的趋势。具体从文化哲学、现代阐释学视野看，由于“前见”与“视界”的存在，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带入了性理解，文化误读与文化融合一样具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因此，面对语言文化差异不能只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更要以开放的态度寻求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谢华 186）。

很显然，文学经典的跨时代、跨媒介重构是推动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点，是解读世界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不但能使文学经典在新世纪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折射出新的光彩，更能促进世界各国民众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下的文化重构与文明转型。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尧斯认为：“文学作品并非对于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像一部乐队总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生命”（尧斯 435）。文学文本本来就是一个等待读者开掘和创造的充满无数空白点的存在，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们可以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因人而异，尤其是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解释者，时空的差异必然会拉大乃至变异文本的原始意义。但是，从思想生成的正向博弈与文化传播的文化增殖角度说，正读、反读抑或误读都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文明史上，有不少文化艺术经典在外传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创造性”或“有意味”的误读，不仅没有扭曲、扼杀反而是丰富、拓展了它们的“现实生命”，完成了一种意料之外的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

文化误读在多数情况下会阻碍跨文化交流，有时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客观地讲，“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大体上具有正面和负面两类影响。从正面影响来说，人们对艺术或人文作品的误读有可能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创造灵感和思想革新的过程，譬如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因“误读”中国古代政治是“最有人权的制度”而建构起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因“误读”中国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而批判并重建了“神示宗教”。但是，“误读”的负面影响更加常见，它们往往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的材料占有不充分或分析不科学的基础上，譬

如“盲人摸象”就以局部代替整体，结论注定是错误的。可见，在很多情况下，“误读”是由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而造成的。

一般来说，“文化误读”往往直接引向“文化误导”“文化误判”甚至“文化冲突”，它歪曲认知对象，加深两种文化彼此之间的鸿沟。“误读”有两种常见的形式。第一种是下意识的误读，主要因双方文化上的差别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常常是当事人以己方的价值观去衡量他方的行为；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对方的结论。第二种情况是有意识的误读，它与下意识的误读迥异；有意识的误读有系统、有理性，有一种较深的文化沉淀，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或是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往往囿于成见。此种误读一般比较稳定，难于与认知对象沟通和对话，也不易在短期内改进。西方不能理解教化在中国传播中的主宰地位，而中国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西方报道总是不停地揭露阴暗面，相互攻讦的情况时有发生（张威）；世纪之交的关于“妖魔化中国”的论争，则为“文化误读”现象再添生动的注脚。

文化误读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且广泛存在。在信息技术“照亮”全球的今天，“误读”的惯性也并未消失，不同的文化体在彼此眼中仍多是“熟悉的陌生人”。文化误读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或个体性的工作粗疏都可能造成误读。误读的常见后果是远离事物的本来面目、堕入谬误泥沼，避免误读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条件，它要求人们详尽地占有事实、准确地进行分析；在鼓励人们对认知对象做大胆解析的同时，要避免远离真理的误读，其间的探索、反复必不可少、艰辛也是可以想见的，中外文化的沟通和理解需要无数的“反”误读方能完成，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和互补。可以说，文化误读是跨文化交流的伴生物，时时处处在发生，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平等、尊重的态度来面对，理解和对话是减少、疏解误读的重要途径。

文学接受中的“创造性”误读：寒山诗的文化旅行

从一般原理上说，误读是主体由于自我理解不足而进行的有目的选择。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作为一种延异的行为，总是一种误读”（Harold Bloom 3）。可以说，他眼中的误读是对先时文本的一种修正，是一种创造性误读。而在美国学者保罗·德·曼看来，文学交流活动中主要由于文化过滤，或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文化的差异，引起发送信息减损或接受者文化渗入，从而造成影响的误差或创造性接受，这就形成误读（Paul de Man 109）。他通过分析文本的语法和修辞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张力，证明任何阅读和阐释行为都无法超越语言的修辞本性，因此也就注定是一种误读行为。但是，他一反人们对误读的负面理解，转而指出误读既有盲点又有洞见：“批评家们对批评假设的最大盲目性时刻也是他们获得最大洞见的时刻，而在他们

们最富洞见的地方，往往同时隐藏着最大的盲视”（Paul de Man 109）。因此，人们必须正视误读的双重特性。

文化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冲击”，是文化交流和演变的必经阶段，它离日常生活实践并不遥远。文化误读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理解的变异”。由于个体的差异，理解必然存在多样性；理解的变异是难以避免的，减少文化误读的最好方法是深层次对话（傅守祥）。“文化误读”的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既涉及语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层面的理论探究，又可对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引。误读不仅存在于符号层面，更存在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矫正符号的误读，更应该传达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他者”在对二者的体验中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经由“他者”的目光反观自身，也能够点亮我们对自身认知的盲区，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而免于狭隘的风险。

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伊始，文化误读便无可规避地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对他者文化真实而全面的认识，长期被传统观念斥责为错误的、负面的。但是，纵观世界文明史，在一定条件下，误读既可以成为促进理解的有效方式也可以成为启迪共同进步的途径，有时也可以“神奇”地打开文化间交流甚至敌对国家间交往的大门，譬如20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寒山热”以及寒山诗在美国的“文化旅行”，为后来的中美建交预留下一道人文“后门”并奠定其民意基石。因此，对文化误读的研究不应仅仅集中在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其在文化交流中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需要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价，同时，它在翻译史上的地位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为美中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一段佳话，人们已熟知20世纪中期美国的“寒山热”，其实，在此之前，还有日本文化史上持续几百年的“寒山热”与寒山经典化神话。

唐代的寒山，作为一位诗风独特的诗僧禅客，其人其诗¹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之外，基本上是被忽视被冷落的。相对于中土的寥落景象，寒山诗在旅行至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时，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土“主流诗人”永远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巨大成就。寒山诗集是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由巡礼参拜天台山的日本僧成寻（1011-1081年），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流传开来的。此后，

1 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它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一部分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寒山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只是一个“陪衬”和“工具”的角色，对于寒山诗的研究也仅仅限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层面。在中国，真正的寒山诗研究肇始于著名国学大师余嘉锡1958年的《四库提要辨证》。此书卷二十（集部一）对《寒山子诗集序》的证伪以及对于寒山生平的缜密考证，让寒山和寒山诗在两岸三地有了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的互动。

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评论在日本纷纷问世，有关寒山的各种神话传说亦被改编成小说，寒山的形象也开始走入日本画史和佛寺神坛。从故国文学中的“被边缘化”到日本文学中的“被经典化”，寒山诗在翻译文学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区銈 胡安江 152）。

更为传奇的是，在故国历经千年冷落，寒山诗经由日本再次飘洋过海，在美国和欧洲众多国家声名大噪且备受青睐，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更是掀起一股颇具规模的“寒山热”。在寒山诗被翻译、传播乃至误读的过程中，美国民众在特殊年代、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期待视野”，以及寒山诗直白通俗的风格与禅机微妙的蕴涵，皆作为一种善意的文化误读打开了大门，大大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理解上的必要性与生发力。发源于中土的佛教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强调自然而然、见素抱朴以及个人直接体验特别是顿悟成佛等，与“二战”后的美国文化潮流一拍即合；禅宗的反偶像崇拜和反权威也吸引了 20 世纪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以及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因为战争苦难、经济萧条、民权运动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纯粹的“美国梦”不断失落、基督教信仰持续迷惘下的美国人，大多将禅宗当作一种精神修行和文化反思，希望借此寻找到一种超然世外之感。

不可否认，美国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¹是这股“寒山热”兴起的关键人物，他选译的 24 首寒山诗问世后，寒山从一个在故国备受冷落的诗人一跃成为美国“垮掉的一代”膜拜的精神领袖。之后，随着寒山相关研究的频繁问世，寒山诗逐渐完成了从本国边缘化尴尬处境到美国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升华。如果说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化基本上不存在语言障碍，那么，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却必须经历语言上的考验。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立足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对寒山诗歌进行了有意识的文化过滤、拣选与阐释变异，即对寒山诗进行了创造性“误读”，从而使寒山诗在旅行至东道国后获得了合法身份并一跃成为其文学体系中的经典；同时，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又进一步强化了译者所代表的文化身份。简言之，斯奈德等人的寒山诗译介使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碰撞与融合，促进了美国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根据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其《理论旅行》中的观点，观念和理论可以从一个人、国度、情景和时代向另一个人、国度、情境和时代旅行；这种旅行或是对原有理论的全部照搬，或是部分借鉴和变异，或是面目全非的改造，以适应异国文化。很显然，寒山诗在美国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旅行中，出现一定的接受和变异是必然的、合理的，英译本《寒山诗》在吸收、借鉴

1 加里·斯奈德，20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2003 年当选美国诗人学院院士，先后出版十六卷诗文集，其中《龟岛》获得 1975 年度普利策诗歌奖。斯奈德是“垮掉派”硕果仅存的少数人之一，与该派其他诗人的张狂相比，他比较内敛，是清晰的沉思大师，深受中日禅文化影响，翻译过寒山诗，喜欢沉浸于自然，其诗“更加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

异质文化以及同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时，是在自身文化本质特征的过滤下进行的；同时，其经典化历程更启发人们进一步关注、挖掘其自身蕴藏的经典性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共识性价值。文化间交流的实质并非一定要取得价值观的一致，更可能是文化交流的双方获得一定的共识，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使得各自的价值观念尽可能保持多元并存。历史告诉我们，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交流是用一种文化丰富另一种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交流渠道的多元化。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从国家对外宣传与翻译策略的制定，到个体译者的兴趣取舍，都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态势。

英国思想家汤因比认为所有文明都具有同时代性和可比较性，这为文明间对话打下了基础。汤因比文明观念中存在两种对话类型：一是已夭折文明间非交往性的静态对话，二是现存文明间交往过程中的动态对话。前者表现为一种没有交往的静态，以间性和关系为基础，以差异为表征；后者是动态对话，包括同一文明历时性对话和不同文明共时性对话。文明因差异、互补、共生、创新而互鉴，而文明间的动态对话则体现了间性的对抗与交融。当今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轨道，体现出“文化趋同与趋异”的动力学的间性张力和开放性的辩证运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存在的差异性开始凸显出来，形成一系列文化冲突现象。如何正确处理各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承，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成为当今社会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

流散文学的文化间性与重生：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

除了寒山诗的美国文化旅行与经典化这类文学接受中的“文明互鉴”佳话，还有流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这类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异质文化集于一身、发而成文的独特现象，它书写被放逐后的无根人生之苦闷、两种文化融通后新的视野优势，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或之“轻”演绎着“文明互鉴”之“痛”或之“欢”，以“左右互搏术”操弄“一心二用”，既重构了“世界文学”又重新定义了“世界公民”，为新型全球化和“地球村”塑造最早一批“新人”。

在全球化潮流和新通信技术的支撑下，以各类移民、流亡者和外籍劳工等群体为主体的流散族裔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超时空的新的共同体，这些处于双重甚至多重文化空间之中的流散群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核心的问题，这涉及对世界格局差异、文化的分裂—冲突—融合以及族群的迁徙—共生的反思。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网络虚拟空间中，流散族裔暂时脱离了地理的局限，建立和维护族群的共享文化和身份认同，穿梭于现实和虚拟、本地和故国的文化空间，追寻新的意义和共同体的建构。

流散文学作为对流散（Diaspora）现象的历史文化内蕴进行诗性表征的

文学样式，滥觞于希伯来圣经正典和次典，近代犹太文学是一种典型的流散文学。流散最初指犹太人散居世界的历史事实，但并非为犹太人独有，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流散族裔运用居住国的语言，书写在异质文化条件下的文化境遇与精神困惑，涌现了大量流散文学作品与作家。伴随 19 世纪后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潮，许多流落异国他乡的流散作家的创作质量上乘，其复杂性与差异性令人目眩神迷，其相通处则体现为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边缘生存中的深重异化与精神分裂。流散文学深度展现流散族群的生存体验及文化心理，作家的双重身份赋予其独特的多维视野，使这类越界写作具备非比寻常的流动性与普世性（傅守祥、李好 213）。

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是一个当前视域与过去视域、自我视域与他者视域相融合的过程，流散作家以“他者”的眼光审视母族的历史与文化，起码是“双重视域”的融合过程。对故国而言，他们是代表西方视域的“他者”；对西方而言，他们又是代表非西方视域的异己。他们在再现母族的历史、神话、幻想、传奇与私人化的情愫之时，这两种视域互相融合进行了密切的文化对话或融通。流散作为文化存在发生于异质文化之间，流散文学突出地昭示了异质文化之间以不同文化态势（强势或弱势）而进行的文化互动及交互关联，因此，文化间性是流散文学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之一。

从文化哲学角度分析，文化间性指的是不同文化际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指一种文化与他者的关联，它克服“文化杂合”、“多元文化”等概念的缺陷，从而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以文化间的相互开放和永恒对话为旨归。它是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镜借的内在关联，它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强调主体与主体的共在和主体间对话沟通、作用融合及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简言之，文化间性表现出文化的共存、交流互识和意义生成等特征。在全球化不断深入与调整的进程中，文化间性理论是一种思考文化多样性的新范式和处理文化差异的新智慧。文化间性理论认知文化间现象，揭示文化间关系问题实质并倡导文化间性主义的文化政治实践；它辩证地看待文化多样性和多样性之中固有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的间性特质，为如何与差异的他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共存确立准则。

文化间性可以理解为不同文化间交流、寻求理解和共同构建的过程。其理论源自哲学，主要代表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文化间性的思路，不同于西方主流强势文化的单向传输和单边主义，它以当代对话主义哲学的平等交流、对话沟通为基础，以华夏和合文化传统的“执两用中”思维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参照。“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间性本位，是即此即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生成物。它是世界各个共

同体间相互协商、谈判、让步、融合的结果，是全球文化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文化间性理论超越文化趋同论和文明冲突论，强调各国文化之间的共存、对话和融通，可以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交往的共同准则，成为建立和谐世界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思路与理论资源。

在全球化日趋深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情境下，当代流散文学的叙述焦点已从远离故土家国和失去母族文化根基而漂泊无依的悲剧处境以及由此而滋生的苦闷情绪，日渐转变为对流散现象的客观性描述和复杂性心态的呈现。当代流散文学不再单单是漂泊者寂寞困苦之情的一种发泄途径，而是边缘生存的流散群体的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代言者，在渐渐斩断空自哀悼的狭隘痛楚之后，逐渐建构出一种文化优势和广阔视野：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背景的流散作家，其作品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界限而进入了全新的“世界文学”，¹为实现新时代的文化融通开疆拓土，体现一种母族与异族之间的文化张力——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既可以“马赛克”式“共存”又可以“海纳百川”式“重生”，进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映射人情人心与世态的、最为独特的标志性文学现象。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流散文学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主流之一，这也是与世界范围内跨文化文学交流与研究的整体趋势相关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新含义：对个体的重视以及解救，才是最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伴随着对流散文学的日渐重视，这种对于人类个体以及灵魂的关注已经延伸到了边缘生存的流散者群体之中。用美国学者萨义德的话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和秘密的流浪人。”（萨义德 45）流散文学的时兴，毫无疑问是对传统文学的话语结构造成了颠覆。面对当今这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时代，流散文学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各民族文学形成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的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分解了传统的封闭的话语结构，推动各国文化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对话，赋予“世界文学”以全新的、多维的视野。

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的双向互动：误读的善缘与恶果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社会、民众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误读”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国际传播的跨文化特性，使其必然“在甲文化中编码，在乙文化中解码”。因此，新闻媒介不仅仅面对单一的社群、民族和国家、单一的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而且面对整个世界。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制约着跨文化传

1 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又译为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它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也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详见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播的有效进行；一般来说，文化差异越大，对外交流的障碍也就越大。因此，传播效果的过程，其实主要表现为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中国文化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市场规律和传播规律，充分尊重文化的双重属性、注重经济市场规律的运用，应当适应中国文化发展的内部需求，满足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和需要。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等于自我表扬，要敢于坦言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要解释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而中国又能带给世界什么；要以对话的方式去讲好每一件事、每一个观点。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被越来越广大的世界所认同和理解。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误读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要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文化误读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文化误读是不同文化发生碰撞的必然过程，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有可能从误读演化为文化冲突。我们应从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的高度来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外来文化加深理解的同时，也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对于善意的误读，给予恰当的解释；对于负面的误读，给予明确的澄清；对于意识形态的歪曲，应坚决加以反对。总体来说，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的总量不够而且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交流的“逆差”。因此，在加大加强未来的跨文化交流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盲点和偏见，避免单一思维判断，自觉培固传统基因和跨文化视野；需要更加注意发挥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的特性，以外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提高传播效力；应该尽量对别人的误读“知其所以然”，尽可能避免我们对别人的误读，尽可能促进平等的深度交流。

外国人对我们误读多多，我们对“外国”的误读也不少。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清末民初的“林译小说”曾经指引国人“睁眼看世界”，既是一段佳话又是一种“形式美妙”的误读与误导（钱钟书 62-95）。这种状况并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即使是在以“严谨”著称的“学术公器”里，也不乏其例，譬如邓晓芒在《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一文中，阐述了自清末民初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思想以来，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上存在的一些误读（邓晓芒 358-366），颇具启发性，从中可以看出所谓“西化”其实存在严重的误解，我们在引进西方概念时总会带入传统的先入之见，从而出现了不少至今未曾化解的不少“误读”。

毋庸讳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无可避免的误读。譬如来自西方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使后者受到了排挤；但这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套用西方学术体系后产生的“水土不服”，是其加入世界浪潮后难免会遭受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震荡”。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但由于人们缺乏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彼此之间存在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传统文化及民族心理差异等，导致文化误读现象频繁发生。毫无疑问，文化也包括各国各民

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在内，有不少文化误读往往同伦理环境的改变和伦理身份（聂珍钊 263）的变化有关，误读往往在不同的伦理选择过程中表现出来。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而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是其主要诱因。

作为当代艺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影视艺术在国家间的文化交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误读产生的历史语境是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认知的错位，当然，这种貌似“自然”发生的偏见不能构成文化误读的合理解释。更值得关注的误读是，西方的影像作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呈现充满主观偏见和想象，而我们却无法用更有力的作品与之对话；我们在影像中所呈现的中国也同样被西方误解，甚至于我们对自身的误解恰恰为西方提供了符合其偏见的认识。20 世纪八十年代，曾涌现出一批文艺精英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却多被西方误读为中国依然愚昧落后，满足了他们对中国偏见性的想象。再如张艺谋 2018 年的作品《影》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元素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却可能出现它体现了中国权谋主义高于公共价值的负面解读。相比于以上这类“驴唇不对马嘴”式的另类想象与粗暴解读，另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是，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西方影片通过对中国元素的加工和包装以及置换核心价值观念，反而成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代言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如此“被代言”“被阐释”“被想象”“被打扮”，或许可以说这些均是文化变异学上的经典案例，但难说是一种“歪打正着”的积极宣传，恰恰正好说明我们在国际话语中的“失语”。在那些西方“代言”的中国文化中，因为编导、制作、表演等过程中有意识有选择的“文化过滤”导致的“文化误读”，其故事是不是真实或者哪个版本最接近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和风尚，因为不同的故事已经就成为我们认识不同类型社会的风向标。

再譬如近日上映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真人版，借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北朝民歌《木兰辞》的故事框架，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木兰辞》着重突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孝”、英勇抗战的“烈”和保家卫国的“忠”，核心是注重忠、孝、仁、义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木兰被迫参军是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但军令不可违；“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更暗示《木兰辞》的背后是战火频仍与民不聊生，女子被迫易妆奔赴战场的悲剧。迪士尼影视化的《花木兰》侧重讲述花木兰追寻自我、化被动为主动的历程，完全是一个西方化的故事模型——木兰受困于旧时代民女平庸乏味的生活，但梦想拯救世界，通过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细致分析，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花木兰形象的再塑造与

迪士尼自《冰雪奇缘》起的“大女主”故事可谓一脉相承：宣扬女性独立自强，淡化男性角色的重要性，迎合了西方当下的主流价值观。英文主题曲 *Royal Brave Ture* 宣扬花木兰作为真正的战士，应该忠心、无畏、正直，强调“失败从来容易，成功更需勇气”，将故事基点立足于个人追求；中文主题曲《自己》更是直接以追寻真实的自己、追寻力量与勇气为核心内容。可见，在西方的影视化改编中，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忠孝观念被淡化，故事核心变成了西方传统的“追寻”母题；故事内容则“变异”为通过花木兰的个人探索，认识真正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电影虽然借用了花木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要素，但经过西方式文化过滤与阐释变异，核心思想已经完全“变异”为西方认可的价值观。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变异，能促进双方的互识、互证、互补，加强沟通与理解，有利于文化融合与新文化的创造。但是，交流对话需要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否则容易导致弱势文化的“失语”。同时，弱势文化一方对他国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应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立场，警惕被异质文化侵蚀。

结语：价值内隐性的连锁误读与后疫情时代的文明冲突

从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来看，因为文化误读，人类干了不少蠢事；即使在数字化网络时代，价值误读、代际误读、古今误读等深层次的复杂问题仍然不可避免。价值是有内隐性的，它寄生在事物、事件中，对于同质文化的群体来说，它是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在交往中互相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然而，对于跨文化的人来说就无法解读而且不便说出“寄生”在事物中的内隐价值；更可悲的是，还让误读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误读，于是，常常发生一误再误的“连锁误读”，导致人际对抗的不断升级。在人类群体尤其是国家之间亦复如此，看看近几年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两国的媒体报道和互联网发声即知“文化误读”的时时与处处。

毫无疑问，价值的寄生性、内隐性成为跨文化交往中误读的触发机制；同理，由于价值的内隐，导致误读双方的“双盲”，即误读者意识不到自己在误读、更意识不到与对方沟通的必要性，误读常常会一误到底；更严重的是，价值误读倘若侵犯人的基准价值——尊严，别看表面的事情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其导致的对抗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不共戴天（祖慰 54）。不止是个人之间的交往以“尊严”与“独立”为底线，国与国之间正常交往的底线也是“尊严”和“主权”，一旦触碰到对方的底线，其对抗是严重的。因此，正确分析和评价文化误读的性质、机制和品格，能够有效地促进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培育文化的包容性和普遍性。

由以上分析可见，文化误读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主观一有意类的比客观一无意类的“误读”所造成的“误解”“误导”“误判”要可怕得多，更难以

在交流中达成有效的沟通和互鉴，甚至难以形成基本的交流与对话。文化误读不仅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古老文明与当下文明之间，亦广泛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心情心态之间。文化误读的根源在于文化具有差异性，作为后来者、非当事人，解读某部作品、品味某种意境，只有无限接近的空间，难有与之比肩同状。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曾言：学我者病。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有句名言：仿我者死，学我者生。这两句名言的意思是说，教条、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只能是病途、死路，学习化用别人的长处才是正途、生路。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文化差异，在加强交流互鉴中，推动多样文明的文化认同，以此实现心相近、共久远。

所谓“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¹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是差异文化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时间段内不断进行着自发性和重复性的交往，由于他们受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限制与影响，常将“他者文化”置于“我之视角”的偏狭想象和荫蔽中，文化误读的现实基础便由此而成。借助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概念，我们期盼差异文化个体或群体在日常交往中超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局限性，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新视角，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更大视域进而促进文化融合、提升文明互鉴的品质。

向世界更好传递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价值观念，在价值共享中促进民心相通，中华文化就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需要“文化自觉”的不断深入。因为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文化交流需求，应该鼓励有资质的个体译者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而形成一种多向互补的文化交流态势，利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理解。实践证明，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存在预先确定的交流次序、交流渠道、交流内容和交流效果，多是一种自发行为，是由个体出发，无序开篇，过程繁杂，最后才能逐渐理出头绪，整合思路，完成交流本身的闭合循环。当然，也有一种由无良政客、奸商等共谋、有组织的、多层次“脱钩”“卡脖子”甚至“断交”“敌对”行为，其后果严重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

毫无疑问，当前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变，风险挑战有增无减。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也是最险恶的时代。后疫情时代，能否有效应对挑战、化解风险，事关各国共同利益，事关世界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最坏的一种可能是，后疫情时代即前争端时代，疫情带给人类社会的撕裂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协作会大幅减少，敌意式误读助推文明冲突到达高潮，人文奇缘被迫蛰伏待机。当前，美

1 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意思是：能听之于耳、虑之于心，叫作聪明；能自我反省，叫作明智；能谦虚克己，叫作强者。

中两国的角力已全面渗透社会各角落，包括经贸与金融、军事与科技、文化与高教等，两国媒体也多在狼烟四起中挑动敌意、让片面事实加剧文化误读，理性的善意渐行渐远，新平衡的探底不断打破中美关系七十年的历史记录。因此，在亟需理性声音的时候，作为社会公器的学术有必要重申文明互鉴、重识文化误读；祈盼人们及早回归理性交往的正确轨道，少些傲慢和偏见、多些尊重和包容，以开放心态与他者对话，在跨文化交流的正常碰撞中促进“和而不同”。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倡的：暴力之外的唯一选择是“对话性民主”（*dialogic democracy*）——即相互承认对方的真实性，准备聆听或辩论对方的看法和观点（吉登斯 133）。人们越来越期盼和平共荣的世界格局，文化是滋润人心、化解矛盾的最好媒介，祈盼构建“和而不同”的文化图景在成为中美两国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成熟稳重。

Works Cited

- Bloom, Harold.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P, 2003.
- Man, Paul de.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P, 1971.
- 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
- [Deng, Xiaomang. “Ten Cultural Dislocations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14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History*. Chongqing: Chongqing UP, 2008.]
-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 [Fei, Xiaotong. “Reflection, Dialogu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ei Xiaotong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4). Beijing: Qunyan Press, 1999.]
- 傅守祥：“尊重文化差异 减少文化误读”，《中国文化报》（2019年7月3日），第3版。
- [Fu, Shouxiang. “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reduce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China Culture News* (July 3, 2019), 3rd Page.]
- 傅守祥、李好：“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杭州学刊》4（2018）：212-223。
- [Fu, Shouxiang & Li, Hao. “Drifting and Grafting of the Root of Culture——On Nie Hualing’s Novel ‘Sang Qing and Tao Hong’”. *Hangzhou Academic Journal* 4(2018): 212-223.]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阿兰·雷：“文化沟通的障碍”，《跨文化对话》第1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 [Ray, Alan. “Barriers t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Volume 1).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ress, 1998.]
- 区鉷、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3（2007）：150-158。

[Ou, Hong & Hu, Anjiang.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Hanshan's Poems in Jap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007): 150-158.]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旧文四篇》。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Qian, Zhongshu. "Lin Shu's Translations." *Four old articl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1979.]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光明日报》(2019 年 05 月 16 日), 第 2 版。

[Xi, Jinping.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or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Guangming Daily*, (May 16, 2019), 2nd Page.]

谢华: “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避免性”, 《江西社会科学》1 (2006): 186-189。

[Xie, Hua. "On the rationa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1(2006): 186-189.]

爱德华·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单德兴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Said, Edward. *On Intellectual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后传统”, 《自反性现代化》, 赵文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Posttradition."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勒内·韦勒克: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 《批评的诸种概念》, 罗钢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Wellek, Rene. "Main tre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Concepts of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汉斯·罗伯特·尧斯: “文学史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蒋孔阳主编: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Jauss, Hans. "The Challenge of Literary History to Literary Theory." *Selected Works of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张威: “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 《国际新闻界》2 (2001): 71-75。

[Zhang, Wei.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and Comparative Journalism."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2001): 71-75.]

祖慰: 《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年。

[Zu, Wei. *Black eyes to Blue Eyes*. Beijing: The Writers Press, 2017.]